

The Structure of “Childlike Innocence” in Modern Korean Children’s Poetry

Yuening Yuan

Guangzhou Urban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92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ildlike innoc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leads to the concept of childlike innocence of various families in China with similar cultural context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a specific period, and the definition of modern Korean children’s poet founder childlike innocence to approach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modern “childlike innocence”.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help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hildren’s poet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humanitarian childlike innocence and the anti-class ideological childlike innocence are compared and sorted out, so that the entity of childlike innocence becomes clear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children’s poetry; childlike innocence; Korea

韩国现代儿童诗中的“童心”构造

袁跃宁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中国·广东广州 510925

摘要

论文以“童心”概念的界定为研究起点,以中国各大杂家的童心观念引出相似文化脉络和历史背景的韩国在特定时期的文化语境下“童心”所蕴含的意义,以韩国现代儿童诗人方正焕对童心的定义来接近现代“童心”的发展脉络。同时借助不同时期儿童诗人的代表作,比较和整理了人道主义的童心和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童心,使童心的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清晰。

关键词

儿童诗; 童心; 韩国

1 引言

同时受儒家传统思想和西方现代文学的双重影响下的韩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步也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儿童文学和童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明确规定儿童文学的整体性并给出定义的同时,童心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为了真正查明儿童文学的整体性,必须先确立“童心”的概念,儿童文学界人士对童心的关注表达和对此的讨论,算是从儿童文学之初就开始了。

2 “童心”概念的启蒙

“童心”是界定儿童文学身份的核心概念。在漫长的时光里,许多研究者将“童心”作为儿童的本质,通过童心来

定义儿童文学,辨析儿童文学的内容和含义。“童心”是什么呢?在英文中,“童心”的单词“Childlike innocence”喻指像孩子般纯真、清白、良性、率真的心性^[1]。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众普遍理解里的“童心”即为“儿童的心”,这种观念是不约而同,不言自明的。就这样,童心一直被先验和意识形态认识。一旦成为先验的概念,人内心形成的概念网络不容易瓦解。如果问什么是童心,无论是问的人还是被问的人,心里都已经有了“童心”的概念。其中,对童心概念的第一个误解是将童心视为幼稚的,低智力水平的,是启蒙阶段儿童具备的心理水平。对童心的第二个误解是将童心定位成所有人类所具有的天然,纯洁并懦弱的本性,将其作为保护对象的观点。这种情况下的童心没有强加于现实的意识形态、而保持人类的原始心性。这种人文主义的童心被认为应当理解所有社会事物,宽容博大的接受一切事物。因此,有其局限性,只突出儿童的纯洁性,而忽视了

【作者简介】袁跃宁(1996-),女,中国吉林白山人,硕士,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福祉等研究。

现实中因阶级矛盾和社会差异导致的各种矛盾和对立。

中国在历史长河中,老子将“婴儿”化为童心的结晶,孟子将“赤子之心”归为童心的样式,禅宗的“禅心”也复归于童心。童心主义从先秦以来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与精华,为古代中国人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思想做出了贡献^[2],到了明代,被李贽发展成“童心说”。

《童心说》是1592年李贽66岁时写的一篇议论文。以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末尾加上的感怀开始,论述了“童心说”。这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加上题目都只有908个字,其中“童心”字样出现了23次。

童心,李贽认为就是真心,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实人的资格。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对李贽来说,童心不是真实的儿童心态,也不是意味处于儿童阶段的心理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念,一种隐喻。他不是儿童文学家,也不担心儿童的生活^[3]。童心只是童心,它是一把可以将人们盲目尊崇的朱理学一股脑推掉的剃须刀。

韩国对于童心探究的萌芽要比我们国家晚一些。在1876年,朝日《江华岛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侵入到朝鲜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朝鲜人民走向了备受奴役的殖民化道路,伴随的还有人民群众反封建反帝国的高涨。这样一场启发人民思想的独立性、自主性的爱国运动也叫做开化运动,从1876年至1910年,这一时期被称作为“开化期”。

1919年的韩国三一运动爆发之后儿童文学创作似雨后春笋般新生发芽,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方定焕。1921年方正焕先生等创立天道教少年会,1923年创办了专门为儿童开设的杂志《儿童》,形成了对“儿童”概念的重新界定,也是儿童尊重意识的开端。沦落为日本殖民统治领域的韩国历史中,并无“儿童”一词,如同中国五四运动之前,儿童的身份未被确立,人们对儿童缺乏理解。在韩语语境中唯有“年幼”一词,泛指愚蠢无知,智力不足,生长发育停滞的殖民统治下的儿童形象。当时成人疏忽对儿童需要的照顾,语言虐待,轻易发火,将儿童视为被支配的存在。就这样,到了20世纪初叶,以方正焕为首的儿童教育家对成人与儿童分配一被分配,的从属关系模式的重新反思中找到了儿童的意义,在儿童这个名字上萌生了新的概念。他们倡导将“儿童”这一称呼与“老年人”和“年轻人”区分开,儿童的存在就像树枝末端新长出的树枝一样,与根相连的“末梢”,

是宇宙形成力发芽的意思。特别在被日本侵略者强烈压迫的时期,即使被广泛定义为脆弱无知的儿童依然存在,难道成人们不应该给予更多的尊重与赞赏吗?于是近代韩国的儿童学家根植于韩语语境下的“幼稚”“年纪小”为义的“小”,赋予给儿童特有的称呼以召唤转变的关系模式并为韩国近代初期儿童文化赋形。方定焕先生将儿童比做“有参与、善良、美丽、创造力量的小上帝”。将他们的未成熟性称为“能创造出巨大东西的力量”来确信儿童的创造能力是无穷无尽的。方定焕先生的启蒙儿童观立足于两个起源。其中一个在当时父母对子女封建自闭的教养态度。另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妨碍。当务之急的问题是,打破形成封建结构的儒教伦理家族关系,其具体表现是女性和儿童的解放。因此,为了重新构造儿童的含义,他进行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运动。杂志《儿童》的创立和天道教的平等意识一起,是凝结于民族意识的少年运动的一环。基于这样的事实上,可以看到方正焕启蒙的文化运动的一面,韩国的儿童不同于西欧和日本发现的“纯真无邪的存在、人性的积极原型、天性的最大持有者”的儿童形象,被发现为处于危机的民族启蒙对象,既是“上帝”,也是“忍耐的天使”。

“儿童”的发现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战略。这样,以《儿童》这本杂志为契机,方正焕的这一著名“童心论”得以诞生,在其后的儿童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穷困和战争等煎熬痛苦的情况下,主流思想表现出的童心的意义转向为更加社会化、意识形态化、现实主义化。

3 韩国近代儿童文学中“童心”思想的构建路径

韩国近代儿童文学是1920年代通过杂志《儿童어린이》(1923.3—1934.2)开辟形成的。《儿童어린이》作为专门为儿童创办的杂志,拓宽了儿童文学的作家和读者层。随后,《新少年》《星星国》(1926.6)等儿童杂志出版后,开启了韩国的儿童文学之路。因此,韩国的近代初期儿童杂志的研究可以说是掌握儿童文学的形成和童心研究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刊登作家们的作品,探讨“童心”的构成方式。童心从根本上不是千篇一律,因此将所有儿童都有同样的童心的观念是错误的。

1920年代韩国开始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时期的诗人们向我们展示了孩子们疲惫不堪的真实面貌,特别是在童谣插图中,可以看到那些人们理想中的被渴望呵护的儿童形象不同,诗人们用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的现实性语言为载

体,描绘出一个个“浪漫的儿童”“工作的少年”“殖民地儿童”等的悲伤儿童形象。

方定焕强调童心是民族的未来,对童心的保护是以瓦解封建主义的思想破坏和对日本侵略者的认识引发了民族范围内的抵抗为基础形成的。在方定焕的《蟋蟀的声音》《衰老的蜻蜓》等童诗中充斥着“下雪的冬天”“刺骨的寒风”等象征着现实残酷的悲凉情景。这样元素的展开源于方定焕对儿童特有的认识。他把所有的儿童视为美丽纯真懦弱的存在^[9]。因此,对“不幸的朝鲜少年们”的惋惜之情同时也包含在其中。在引用的同时,不仅让人认识“寒冷”的现实,更让他们产生同情的悲悯情怀。作者比拟“下雪的冬天”和“寒冷的风”作为儿童无法解决的状态。因此,急需建立能够逃避残酷现实的乌托邦空间。这是实现他儿童文化运动的核心。以此为基础,方定焕从事儿童文化运动和杂志的出版、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以及童话表演等多种活动。这是为了解放受封建主体和日本帝国主义镇压的儿童意志,因此也构成他的童心论。

他在儿童文学中,明确展开了对其文学主体之儿童的怜悯慈悲之情怀。此时代下韩国的童心与西方天使般自然性倾向的童心相比,更突出了时代的韵味——被抛弃在不幸现实面前的懦弱的童心。

镶嵌在童年意蕴中的童心,作为童年的内在精神,支配整个童年周转运作的核心,它必然不能脱离包括空间维度以及时间维度的文化情景脉络。近代视野下韩国学者们所传达出的“童心”这一语境也许并不是以儿童为对象的信息,而代表着无论男女老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普罗大众的生存现状。

4 童心和阶级话语的两个层次

与《儿童》同年出版的《新少年》在成立之初就针对纯儿童文学,但在1927后来的几年中,在卡夫(Kaf)^[10]的影响下,发展成提倡阶级主义儿童文学的先锋。因此,在这个时候,儿童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是,在1931年第二次Kaf(카프 2차)转机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9]。儿童文坛也从1928年确立“《星星国》杂志定型后开始批评儿童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儿童”,并活跃地出现了以“新少年”“星星国”为主轴的阶级主义儿童文学。不难发现对当时韩国“儿童”的偏见,民族阵营和阶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将童心最大限度的削弱。

还有一个被韩国学者们热议的争论是近代儿童文坛形成期讨论的“童心”是以殖民地朝鲜儿童为对象的“童心”,

还是为了解决对日本殖民的民族矛盾产生的抵抗性“童心”。因为解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的民族矛盾的同时,还夹杂着寻找“儿童”社会地位的问题。这里以方定焕先生1929年之后的诗为例,1929年开始发表的作品与之前的儿童诗不同。在同时期的《小奴婢》中,他表现了当时的时代情况:“瑞士兵”和“法国兵”穿着黑色的服装聚集在一起,“眼前一片天/杂乱无章”。这种社会混乱在诗作《我们家》里具体表现为“我家是穷汉/农民的家”。

前文所述方定焕初期倾向于儿童拥有的是脆弱的,需要受人保护的童心。但是受当时卡夫的方向影响,观点也从封建矛盾转向阶级矛盾中来。随之,童心也从消极的童心转变为积极的主体。例如,在其诗作《我们家》里出现的童心是具有积极性和阶级斗争倾向的主体。“我长大了/成为了大人/重新盖房子的积极的儿童形象建立起来。这个童诗中可见诗人把家庭贫穷的理由归咎于社会阶级斗争原因。“整个夏天都在流汗/锄草/冬天没有大米/挨饿的房子”中可以看出,作者意识到贫穷的原因不是个人无能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上的矛盾。因此,方定焕的童心从“懦弱的怜悯的童心”扩大到“阶级主义的童心”。阶级主义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显示出的阶级性是为了克服现实矛盾的意识形态,童心的追求是对殖民地现实的克服和整合,以及蕴涵了实现理想社会为依托的价值精神。也就是说,童心无论是阶级阵营还是民族阵营,都是民族未来的精神依托。

为了战胜贫穷的现实,没有任何装置,只有“铁拳”和“热血沸腾的心”,这种文学作品中儿童形象的积极性是对资产阶级的敌意。

5 相互构成的对话和沟通的童心

1920年中期,在三一运动的挫折中,少年运动正在展开。在这样的时期,社会承认儿童并在文学上以童心为主体。在同一时期,韩国儿童文学家们比起对现实启蒙主义或者阶级主义的关心,对美和艺术性的关心呼声更高,所塑造的儿童形象也是更明朗开阔的。下面是摘录《儿童》杂志中的《金达莱》一诗。

金达莱

申告颂

山坡的向阳地/春天来了/金达莱花/开花。

樵夫午饭也在/向阳/金达莱香的下面/开放。

春天来了,山坡上有“金达莱花开了”的抒情情景下,可以看到连接了“向阳、春天、金达莱花”的明朗情绪。这种明朗的形象与“樵夫”辛苦劳动的形象形成对比。春天的

向阳地里,金达莱香(自然)和融为一体的樵夫,谁不压迫或强制谁。另外,在这首诗里也不会暴露艰难的现实,引起敌对性的愤怒或怜悯之情。只是通过抒情来畅想实现一致幸福的生活。

这里诗人所指的童心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情感而获得。这种世界认识将自然纯真视为童心。这与方正焕形成的同情的童心区分,也分为想要摆脱“善良”和“怜悯”的童心。逐渐地,在韩国现代儿童诗人的对于童心的逐渐构造过程中也发现了儿童的伟大之处,1930年后,韩国的儿童诗人们削弱了自身对儿童的意志和先验,相互构成对话和沟通关系中对童心的认识正在形成^[6]。因此,诗人的声音不是被同化,而是承认大人和儿童的差异,形成了儿童成为主体的童心。

6 结语

主要以韩国1923—1930年前后的历史经历为背景,初步观察了韩国童心的构成历程。通过方正焕等诗人们的儿童诗,比较和整理了人道主义的童心和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童

心,使童心的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清晰。

注释

① KAPFKAPF这个名字是“Korea Artista Proleta Fedeatio”的缩写是世界语的名字。世界语是为了克服19世纪末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着各种民族的内讧,由霍夫博士设计的语言。认为沟通困难就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的霍夫创造了世界共同语言,那就是世界语。

参考文献

- [1] 张美红.周作人与方正焕:中韩早期现代儿童观形成之个案研究[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29(5):12-14.
- [2] 陈乐乐.中国式“儿童发现”的完成:李贽“童心说”源流及内涵[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7):12-16.
- [3] 刘晓东.童年哲学论纲[J].江苏教育,2019(18):13-22.
- [4] 卢梭.爱弥儿(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5] [韩]김인옥.방정환의 아동관과 문학관[M].2020.
- [6] [韩]김종현.한국 근대 아동문학 형성기 동심의 구성방식[M].2003.

(上接第66页)

5.2 对音乐形象塑造的影响

扬琴音乐中表现的形象一般可以分为作者自身形象的塑造和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作者自身形象的塑造方面,往往没有具体的描绘,只是通过音乐,运用不同的演奏技法体现作者心理和情绪的变化;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则通过在演奏过程中描绘不同的场景、人物性格来实现,如乐曲《昭君怨》中,运用了滑抹音、颤音、顿音、大量装饰音等演奏技法,乐曲的旋律充满了一丝寂寞和幽怨,刻画了王昭君远嫁“和番”,为民族团结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形象。

5.3 对扬琴音乐风格的影响

音乐风格指的是音乐艺术的创作和表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独特的格调和韵味,对于扬琴的演奏来说,通过不同的演奏技法可以展现出不同的演奏风格,而这也正是区分不同演奏流派的重要标志。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扬琴的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如何区分不同地方的民族风格,

就需要依靠扬琴的音乐风格。所以,教学改革中体现的对扬琴演奏技术的创新技法,有利于促进扬琴演奏流派的丰富性,有利于发挥扬琴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独特音乐魅力。

6 结语

在当前的扬琴教学中还存在着如忽略学生主体地位、缺乏足够的实践以及扬琴教师综合水平不高等问题,因此需要针对扬琴教学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扬琴演奏的技法,对扬琴艺术有更加系统结构和全面的认知。

参考文献

- [1] 杨易.心灵的启迪——关于扬琴教学的思考[J].戏剧之家,2015(3):8.
- [2] 黄坤.扬琴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青春岁月,2015(6):8.
- [3] 谢玉虹.扬琴教学改革的成效与启示[J].中国音乐,2009(4):18.